

## 第四章、提出「三個代表」的經濟社會背景

本文前三章提出，中共在 2000 年「三個代表」中，將統治合法性由工農階級轉向其他更具生產力的社會階層的原因，必需從影響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的兩個因素：「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以及「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的互動來理解。中共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意識型態模式，屬於「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領導人政治路線也有共識」的類型。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目的，是在前三章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中共統治合法性轉變的原因。

中共市場化的運作引發許多效應：過去的公有制經濟優勢不再、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社會中分化出新興的階層、以及國企改革使許多黨員成為資本家等。這些現實變化讓對領導人產生壓力，體認到傳統意識型態的侷限。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可以選擇緊抱傳統意識型態的教條，讓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繼續擴大；也可以選擇調整意識型態，使之符合現實而脫離烏托邦理想。從中共領導人的言論中，可以發現他們選擇了「調整」，讓意識型態延續市場化路線，進而促使了中共合法性基礎的轉變，從帶領無產階級走向共產主義天堂，轉而擴及更有生產力的階層來滿足人民具體需求。第四章的重點是分析「三個代表」的經濟社會背景，說明中共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之後，產生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動，對中央所形構的壓力。第五章的重點是中共提出「三個代表」的領導互動因素，說明中共在面對經濟社會變動時，領導人對延續市場化路線的共識，來分析「三個代表」此一意識型態論述的出台經過。

本章說明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市場化的成效已經使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出現新的變動，公有制地位下降，民營經濟則越來越茁壯，而這些現實發展成為了學界和政界關注的重要議題。第一節是私營企業的發展趨勢，從客觀指標如發展速度、產值、稅收、吸納就業等方面說明私企的茁壯。第二節是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要求，從主觀指標如政治參與、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階層意識等方面

說明私營企業主對政府的期待與壓力。第三節是經濟社會變動對國家的壓力，說明政府和學術界認知到這些現實發展的情況。

### 第一節、私營企業的發展趨勢

中共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資本家成為獲利者。1980年代興起的個體經濟或私營經濟規模都很小，影響力和社會地位都較低。但隨著1990年代新一波改革浪潮出現以後，改革的重點集中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引起了大批幹部和國有企業經理人的下海，投入經商活動，尤其此時中國大陸學界和官方認為國企產權不明晰是企業效率不彰的主要原因，因此這一波以國有企業產權明確化為目標的改革，給予私營資本發展的大好機會。<sup>1</sup>

在1994年市場化路線確定以後，過去以國有、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形勢，開放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勢，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比例逐漸上升。市場透過資源配置、新興的運作特性，對社會結構和政治進程發揮影響，在階層分化和新興階層掘起的現象當中，又以私營企業的發展，以及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最引人注目。私營企業主是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並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的人，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由此可見，私營企業不是以個人勞動為主，而是透過「僱傭勞動」這一中介環節才使勞動和生產資料相結合，在過去曾被視為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因此受到國家政策的限制發展。<sup>2</sup>

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私營企業已經成為政府鼓勵發展的經濟形式，工人與農人的生產力也相對下降，工人階級不再是社會中的先進勢力，也不再代表多數人的利益。1988年中共13屆2中全會第一次承認中國社會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

---

<sup>1</sup> 黃德北，「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革開放與中國資本家的產生」2005年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2日。

<sup>2</sup> 中共於1989年8月28日發出了《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第442頁。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依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sup>3</sup> 本節目的是從客觀的指標，如私營企業的發展速度、負擔國家經濟產值的貢獻、負擔國家稅收就業的功能等方面檢視私營企業的發展趨勢。

## 發展狀況

1990 年代末期以後，中國大陸市場化的程度不斷增加，1999 年市場化指數提升到 50.25%，屬於「準市場化國家」。<sup>4</sup>在各類企業中，私營企業發展速度最快，而且註冊資本增長迅速，經濟實力逐年增強，私營企業之所以發展較快，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它的起點低，基數小；二是它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配置社會資源，產權明晰、責權清楚，在市場競爭中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三是經營者大多年富力強，沒有過多的社會負擔，能夠全力投入經營。<sup>5</sup>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統計資料，從 1993 年到 2002 年私營企業主持續擴大，人數由 1993 年的 51.38 萬人增加至 2002 年的 622.82 萬人，增長了 11.12 倍；註冊資本金由 681 億元增加到 24756.2 億元，增長了 35.4 倍；登記的私營企業戶數由 23.8 萬戶增加到 243.5 萬戶，增長了 10.2 倍。相反的，同一時期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戶數則由 195.17 萬戶，減少到 117.25 萬戶；集體企業戶數由 515.65 萬戶減少到 188.59 萬戶，分別下降了 66.46% 和 173.42%。統計數據如下表五所示：

<sup>3</sup> 皖何，「利益集團、改革路徑與政治合法性危機」，**當代中國研究**，2001 年第 4 期（總第 75 期），頁 66-71。

<sup>4</sup> 胡鞍鋼，**影響決策的國情報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97。

<sup>5</sup> 張厚義、明立志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前言。

類別/年份	1993	1995	1997	1998	1999	2001	2002
私營企業家人數	51.4	134	204.2	263.8	322.4	460.84	622.82
私營企業戶人數	23.8	65.5	96.1	120.1	150.9	202.86	243.53
註冊資本總額	681	2,622	5,140	7,198.10	10,287	18,212.2	24,756.2
戶均註冊資本額	28.6	40.1	53.5	59.9	68.2	89.8	101.65

資料來源：汝信、陸學藝、李培林編，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313。

私營企業發展速度很快，經濟實力逐年增強，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都是小型企業。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登記資料，全國平均計算，2000年雇工人數在10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有4.08萬戶，占其總戶數的2.32%。其中，雇工人數在100-500人的占94.21%，500-1000人的占5.11%，1000人以上的占0.63%。戶均註冊資本在100萬元以上的有27.33萬戶，占其總戶數的15.51%。其中註冊資本總額在100-500萬元的占73.80%，500-1000萬元的10.25%，1000萬元以上的4.94%，註冊資本額超過億元的有219戶。2001年每戶僅有從業人員13.38人（其中投資者2.27人），註冊資本不足90萬元，規模大的企業所占比重不大。私營企業上市的數量很低，截止到2002年6月底，境內A股市場上共有139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為私營企業，它們占同期境內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11.84%。私營上市公司股本額僅占滬、深兩市上市公司股本總額的6.76%。<sup>6</sup>

私營企業主開業前的最後職業和教育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最後職業方面，1993年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私營企業主開辦本企業之前以普通工人所佔比例最高，到2002年此比例下降了4倍，農民比例下降更多，達5.4倍。將近十年的以後，私營企業主則以各類企事業單位的幹部為主體，企業負責人所佔比例從1993年占15%，到2002年已經上升到佔一半以上。這顯示私營企業主的來源以經濟菁英為主，普通百姓創辦企業的機會越來越少。數據如下表六所示：

<sup>6</sup> 張厚義，「私營企業發展的現狀與趨勢」，2003年1月25日，「WTO與法治論壇」：<http://www.wtolaw.gov.cn/display/displayInfo.asp?IID=200301251651315898>

主要職業	1993		2000		200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專業技術人員	151	11.1	291	10	210	6.7
機關事業單位負責人	81	6	117	4	103	3.3
企業負責人	209	15.4	1040	35.8	1738	55.4
辦事人員	-	-	158	5.4	126	4
普通工人	325	24	256	8.8	152	4.8
商業服務業員工	98	7.2	141	4.9	125	4
務農農民	165	12.2	165	5.7	59	1.9
專業戶	-	-	107	3.7	-	-
個體戶	120	8.8	501	17.3	478	15.2
軍人	14	1	10	0.3	15	0.5
其他	68	5	101	3.5	114	3.6
工匠	125	9.2	-	-	-	-
無職業	-	-	16	0.6	15	0.5
合計	1,356	100	2903	100	3135	100

資料來源：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251。

在私營企業主的教育程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和1993年比較，國中及其以下的教育程度由47.0%下降至19.7%，高中、中專程度由35.9%上升到41.1%，大學、大專程度由16.6%上升到33.5%，研究生由0.6%上升到4.9%。此意味著低學歷的人越來越難進入私營企業主這個階層。數據如下表七所示：

年份	沒上過學	小學	初中	高中、中專	大學	研究生	合計
1993	1	9.9	36.1	35.9	16.6	0.6	100
1995	0.3	8.2	34.9	38.1	17.6	0.8	100
1997	0.3	6.3	31.5	41.7	19.5	0.7	100
2000	0.2	2.7	19.6	39.2	35	3.4	100
2002	0	2.2	17.5	41.9	33.5	4.9	100

資料來源：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49。

### 私營企業對國家的貢獻

私營企業對國家的貢獻，包括在產值、稅收、就業方面的成長，以及帶動地

區經濟的發展。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資料，從 1992 年到 2002 年，工業總產值由 205 億元增加到 15338 億元，十年總增幅為 74.8 倍。實現稅收由 4.55 億元增加到 945.6 億元，十年總增幅為 207.8 倍。吸納就業由 232 萬人增長到 3,409 萬人，十年總增幅為 14.7 倍。1992-2002 年私營企業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貢獻如下表八所示：

年份	產值		實現稅收		吸納就業	
	億元	比 1992 年增長之倍數	億元	比 1992 年增長之倍數	萬人	比 1992 年增長之倍數
1992	205	-	4.55		232	-
1993	422	2.1	10.46	2.3	373	1.6
1994	1,140	5.6	18	3.9	648	2.8
1995	2,295	11.2	36	7.8	956	4.1
1996	3,227	15.7	60	13.2	1,171	5.0
1997	3,923	19.1	90	19.9	1,305	5.6
1998	5,853	28.6	163	35.8	1,710	7.4
1999	7,686	37.5	255	56.0	2,022	8.7
2000	10,740	52.4	414	91.1	2,406	10.4
2001	12,317	60.1	918	201.7	2,714	11.7
2002	15,338	74.8	946	207.8	3,409	14.7

資料來源：修改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 257。

從表八歷年絕對數字的成長來看，可以發現在 1998 年時，私營企業產值、稅收、吸納就業的增長速度突然暴增。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1997 年十五大以後，鄉鎮企業的改革深化到以產權制度為核心，股份合作制是重點，配合兼併、出售、破產、租賃等形式，<sup>7</sup>使鄉鎮企業所有權大幅由公有制轉向股份合作制和私有化。因此造成私營企業在產值增長方面，1992 至 1997 年之間成長數字皆在 1,000 億元之內，但是 1997 至 1998 年時，則暴增了近 2,000 億元，1999 至 2000 年成長超過 3,000 億元。在實現稅收方面，1992 至 1997 年之間成長數字皆在 30 億元之內，但是 1997 至 1998 年時，則暴增了近 70 億元，其後的成長數字更大，

<sup>7</sup> 張曉山等著，*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備忘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3；關銳捷主編，*中國農村改革二十年*（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年），頁 124。

1999 年和 1998 年相差 90 億，1999 和 2000 相差 160 億，2001 和 2000 更相差了 500 億。在吸納就業方面，1992 至 1997 年之間成長數字皆在 200 萬人之內，但是 1997 至 1998 年時，則暴增了 400 萬人，其後皆每年成長 300 至 400 萬人。

1998 年以後私營企業產值、稅收、吸納就業開始呈現大幅成長，這些數據的暴增，雖然和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後統計口徑的改變有關，但是股份合作制與私有制的增長，無疑對公有經濟的優勢地位產生嚴重衝擊。這也說明了中共深化經濟改革後，使 1998 年到 2002 年之間經濟、社會的變動更加劇烈。而這段時間也正好是「三個代表」從醞釀形成，以致最終確立的時段。

此外，民營企業還發揮了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功能。東部的發展較好的省分，如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和北京，私營企業戶數就占全國總數的 55.2%。但是中、西部地區私營企業戶數只分別占全國總數的 17.3% 和 13.8%，經濟發展較落後。中國東部地區集中了全國 2/3 以上的私營企業，並繼續呈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2000 年底，東部地區有私營企業 120.62 萬戶，比 1999 年同期增長了 19.2%；占其總戶數的 68.46%，比 1999 年增長了 1.4%。全國超過 10 萬戶的 6 個省、市均在東部地區。它們是：廣東（184218 戶）、浙江（178771 戶）、江蘇（174113 戶）、山東（141229 戶）、上海（138189 戶）、北京（102787 戶）。這 6 個省、市的淨增長量均超過或接近 2 萬戶：江蘇（+3.84 萬戶）、浙江（+3.24 萬戶）、上海（+2.82 萬戶）、廣東（+2.31 萬戶）、山東（+2 萬戶）、北京（+1.96 萬戶）。西部地區在大開發政策鼓舞下，私營企業發展速度加快，其戶數為 23.6 萬戶，比 1999 年同期增長 2.15%，占其總戶數的比重為 13.4%，比 1999 年增加 0.32 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其戶數為 31.95 萬戶，比 1999 年同期增長 5.72%，占其總戶數的比重為 18.13%，比 1999 年下降 1.9 個百分點。<sup>8</sup>

### 民營經濟對公有制之衝擊

<sup>8</sup> 張厚義，「2001 年中國私營企業發展狀況」，2001 年 12 月 24 日，「中國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society/89639.htm>

民營經濟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發展快於公有制經濟的發展，<sup>9</sup>公有制經濟的優勢逐漸受到挑戰，50%的臨界點已被突破。在國家經濟產值的貢獻比例上，據國家統計局計算，1997 年國家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實現 18,096 億元，占全國生產總值的 24.2%。<sup>10</sup>2001 年，個體、私營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超過 20%，民營經濟提供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已經佔到全國 GDP 的 1/3。<sup>11</sup>2002 年民營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 48.5%，如果加上外資和港澳台投資，則達到 64% 的絕對優勢。<sup>12</sup>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受到衝擊。

對就業的貢獻方面，民營經濟在萌芽、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抒解了中共轉型時期的就業壓力。從表九中可看出民營經濟就業占全社會的比重，到了 2002 年占全社會就業總量的 42%，在二三產業比重達 84%，在城鎮就業總量占 71.1%。相較於民營經濟吸納的就業比例，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只佔了全社會的 9.7%。民營經濟中又以個體私營經濟吸納就業的速度最突出，從 1991 年到 2002 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 11.8%，超過全社會年平均增長 10.7 個百分點。<sup>13</sup>

年份	1991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民營占全社會比重 (單位：億人，%)	25.1	32.6	35.5	37.2	38.7	40.2	41.9
民營占二三產業比重 (單位：萬人，%)	62.2	65.1	70.8	74.5	77.3	80.5	83.8
民營占城鎮就業比重 (單位：萬人，%)	38.9	46.9	58.1	61.8	65	68.1	71.1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 (2003)**，頁 5。

<sup>9</sup> 「民營經濟」是指國有和國有控股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如果沒有特別註明，則不包括外資企業。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 (2003)**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4。

<sup>10</sup> 楊繼繩，**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 5 月)，頁 220。

<sup>11</sup> 「第十二屆蘭州投資貿易洽談會直播」，2004 年 8 月 23 日，「新華網」甘肅頻道：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s.xinhuanet.com/zhibobd/2004-08/23/content\\_2733798.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s.xinhuanet.com/zhibobd/2004-08/23/content_2733798.htm)

<sup>12</sup> 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 (2003)**，頁 8-9。

<sup>13</sup> 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 (2003)**，頁 4-7。



在財政稅收方面，如表十所示，民營經濟上繳的稅收比重逐年增加，相較於國有企業逐年下降的情況，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而且在 2001 年時民營經濟的稅收首次超過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占 36%，國有經濟占 35.4%。在稅收增長率方面，自 1995 以來民營經濟的增長速度一直快於國有經濟，國有經濟的增長在 1998 年以後更趨緩慢，1998 年比 1997 年下降了 9 個百分點，到 2001 年以後更是落到負成長。在民營經濟的上繳稅收當中，又以私營企業的稅收增長速度最高，從 1995 年以來連續八年在 40% 以上。<sup>14</sup>

年份	稅收比重		稅收增長率	
	國有	民營經濟	國有	民營經濟
1995	61.4	31.4	10.4	26.2
1996	60.5	34.1	9.7	12.8
1997	58.6	34.4	13.1	16.8
1998	55.2	34.5	4.1	13.4
1999	50.8	37	4.3	18.5
2000	42.6	35.3	3.1	17.4
2001	35.4	36	-0.6	22.1
2002	31.5	36.9	-0.2	14.8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2003），頁 11。

本節從私營企業的客觀指標，如發展速度、負擔國家經濟產、稅收、就業、帶動區域經濟的功能，以及對公有制的衝擊方面等檢視其發展。下一節從主觀層面來探討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要求。

## 第二節、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要求

私營企業階層的擴大，進一步使觀念產生變化，不只消除了過去對政治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對政治菁英的盲目順從，社會地位上升更使他們具有政治利益訴求的議價能力。本節從政治參與、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階層意識等方面探討

<sup>14</sup> 黃夢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1（2003），頁 10-11。

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要求。

### 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

私營經濟主逐漸形成共同的利益，並積極參與政治和國家的政策制定，從而爭取階層的政治利益。由於私營企業者控制資本與技術，相較於其他工人、農民等大眾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佔有強勢地位的群體。中共如果放任他們在政權體制之外發展，又不改過去的政治歧視態度，那麼很有可能刺激私營經濟的菁英們形成反黨力量。換句話說，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社會結構中的主流社會階級不再是工農階級，而是掌握經濟大權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私營資產階級，如果不正式與他們結盟，就是在擴大政治對立面。<sup>15</sup>

首先，私營經濟主具有鮮明的參政動機。私有企業雖然在 1987 年獲得合法地位，但是卻一直沒有獲得和國有企業同等的政治、法律地位，因此他們積極爭取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以求突破種種歧視。<sup>16</sup>私營企業主從事各種政治行爲的目標是以經濟利益爲核心，政治權力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階層隊伍的擴大，私營企業主一定會提出相應的政治要求，並實現一定的政治參與，以表達自己的階層意識和願望、要求。透過政治參與爲企業的發展尋求較爲寬鬆的外部環境，提升自己的社會聲望和政治地位，提升企業的知名度，同時爲自己和企業爭取政治上的保障。<sup>17</sup>在此動機之下，許多讓私營企業表達政策需要的媒體和管道紛紛出現，例如**中華工商時報**、**民營經濟內參**、**全國工商聯盟**、**行業性組織**或**地區性組織**…等。學術活動也有很多爲發展私營經濟說話的政策主張，知名學者成爲私營企業的獨立董事，提出對中央決策具有影響力的言論。

在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動機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企業資本規模越大，企

---

<sup>15</sup> 徐斯儉，「中共十六大與政治改革」，頁 42。

<sup>16</sup> 楊繼繩，**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頁 241。

<sup>17</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經濟**，2003 年 11 月号。「中華企管網」：<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

業主的政治需求就越迫切。戴建中統計歷次全國抽樣調查（1993、1995、1997、2000、2002年）數據，資本額1億元以上的企業主有56.8%希望立法保護私有生產資料，有35.1%希望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兩項政治要求的比例都高於其他資本額的業主。在希望立法保護私有生產資料方面，資本額100萬以下、100-1,000萬、1,000-1億支持的比例分別是40.7%、47.7%、49.8%。在希望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則依序是20.9%、28.4%、30.2%、35.1%。<sup>18</sup>

其次，私營經濟主可以直接參政。私營企業主經過黨委有關部門的推薦，可以經過基層選舉，進入從全國到地方的各級民眾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或者在工商聯、青聯、婦聯等社團組織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參與各類政治活動。

在私營企業主加入各級工商聯組織方面，2002年的比例是83.4%。<sup>19</sup>工商聯是中共中央規定下，黨領導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民間商會，功能是在經濟上為私營企業等服務包括反映私營企業主的意見、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幫助他們解決經營中的困難。僅僅在1999、2000兩個年度，全國工商聯就提交310件團體提案，浙江省工商聯的團體提案是：關於要求盡快製定《浙江省私營企業權益保護條例》的建議，並附有保護條例的「建議稿」（共28條）。江蘇省工商聯的提案則是：關於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納入勞動模範評選範圍的建議。<sup>20</sup>

在私營企業主加入政協、人大方面，全國第五次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02年各級政協委員占35.1%；各級人大代表占17.4%，其中縣市兩級占16.5%。十六大以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迅速登上中國政治舞台，十屆全國人大中有55名私營企業主，2003年3月十屆全國政協中有65名私營企業主，而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僅33人，私營比國營代表人多出一倍。<sup>21</sup>2003年1月，資產超過8億的

<sup>18</sup> 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47。

<sup>19</sup> 徐雲齋，「中共對私企業主等『六種人』的政治定位說明了什麼？」**當代經濟**，2003年第6期，頁18。

<sup>20</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

<sup>21</sup> 徐雲齋，「中共對私企業主等『六種人』的政治定位說明了什麼？」，頁18。

浙江省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為省政協副主席，重慶市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這是中共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首次進入省級領導班子的私營企業家，在此之前從來沒有擔任過省級職務。民營企業家們開始步入更高層次權力通道。

此外，私營企業主還有其他的參政管道，例如自發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或其他民主黨派、自選參與地方領導職位選舉、建立自我保護和相互協調的仲介組織…等。甚至有的私營企業主還被選為各級勞動模範。<sup>22</sup>2003 年度，全國有 8 家私營企業首次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有 3 位私營企業主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私營企業主的企業資本規模越大，擔任較高級別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職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 2001 年「福布斯」(Forbes) 雜誌公布的 100 名首富名單中，6% 是全國人大代表，16% 是全國政協委員。2001 年「福布斯」雜誌公布的 100 名首富名單中，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比例分別是 9% 和 13%。<sup>23</sup>戴建中統計歷次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企業資本規模越大越容易取得高級的政治職務，數據如下表十一、續表十一所示：

企業資本規模		100 萬以下	100-1,000 萬	1,000-1 億	1 億以上
人大 代表 級別	鄉	4	7.7	6	2.7
	縣(市)	3	5.9	11.7	5.4
	地(市)	2	4	10.3	16.2
	省	0.4	0.4	2.3	2.7
	全國	0	0.1	0	0
擔任人大代表合計		10	18.1	30.3	27

資料來源：整理自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45-146。

<sup>22</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

<sup>23</sup> 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46。

政協委員級別	鄉	0.3	0.4	0.2	0
	縣(市)	18.3	24.3	22.8	16.2
	地(市)	5.4	10.9	17.5	24.3
	省	0.2	1.3	4.8	10.8
	全國	0	0	0	5.4
擔任政協委員合計		24.2	36.9	45.3	56.7
工商聯正副會長級別	鄉	1.2	2.5	2.3	0
	縣(市)	5.9	11.2	13.4	8.1
	地(市)	1.1	3.3	7.8	18.9
	省	0	0.1	1	2.7
	全國	0	0	0.4	2.7
擔任正副會長合計		8.2	17.1	24.9	32.4

資料來源：整理自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45-146。

從私營企業主的代表進入各級政治機關的比例和資本額顯示，政治菁英和經濟新貴找到了利益的結合點，<sup>24</sup>其他社會弱勢階層則成爲相對被忽視的群體。私營企業主在很長的時期中毫無政治優勢，新身份也才釐清不久，但因掌握經濟優勢，其政治要求的實現程度會高過其他經濟基礎較弱的階層。<sup>25</sup>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近年來出現新「兩多兩少」的趨勢，即個私企業所有人多、社會弱勢群體少；經營管理者多、普通職工少。<sup>26</sup>絕大多數代表只來自少數幾個階層，如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知識分子、農民企業家、農村黨政幹部等，還有就是來自個私企業所有人、經營管理者等新階層。而人數最多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中的代表則是鳳毛麟角，處於社會底層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則幾乎沒有代表產生。中共雖

<sup>24</sup> 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48。

<sup>25</sup> 董明，「經濟人還是政治人—中國私營企業主政治心態剖析」，**中外管理導報**，1999 年第 5 期，頁 18。

<sup>26</sup> 儘管實際上代表的構成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但統計數字依然保持着穩定平衡。這是因爲很多地方爲了使構成符合要求，隨意調整統計標準，如把領導幹部代表中學歷較高的計入知識分子代表中，把個體私營企業主和經營管理者代表計入工農代表中，等等。張敬武，「從代表構成看公民的政治參與」，**人大研究**，2005 年第 1 期（總第 157 期）：

<http://www.rdyj.com.cn/2005/rdqk-1-04.html>

然提升了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讓他們表達政治訴求，達到了擴大政治參與的作用，但是卻不一定達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 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

雖然中共在 1989 年《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明確規定私營企業主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現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1990 年代中期以後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私營企業主上升的比例很快。原因是許多企業主在開業以前已經是中共黨員，加上 1990 年代中共明確了市場化改革取向後，國企改革也使大量黨員幹部與黨員知識份子「下海」經商。換言之，在「三個代表」出爐以前，號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私營企業主的數量已經大幅攀升，形成自我定位與現實形勢相脫節的現象。意即「紅色資本家」的存在是當代中國矛盾本質的反映：一個秩序並不良好但卻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的混合體。<sup>27</sup>

Bruce Dickson 對中國大約 600 名私營企業家和 200 名地方官員進行了調查，估計中國大約有 20-30% 的私營企業家是中共黨員，其中有三分之二在經商前已經入黨，另外三分之一則是出於商業需要入的黨。<sup>28</sup> 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結果發現，黨員私營企業主多數是戴著「紅帽子」的「假集體企業」，少數人是在基層黨委默認下變更法定代表人（一般是將法定代表人更換給配偶），還有極少數是在各地致富成功後而被動員入黨的。因此，從黨員私營企業主入黨時間看，90% 以上都是創辦企業前加入黨組織的。但是也有 192 人（占黨員總數的 5.9%）是創辦企業後入黨的。<sup>29</sup>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早期私營企業主上缺乏入黨

---

<sup>27</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57.

<sup>28</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8.

<sup>29</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張厚義、劉平青，「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黨建研究」，2003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wzj.gov.cn/PartyBuild/fgpartyinfo.aspx?id=193>

願望，私營企業發展之初，企業所有人忙於經營，無暇過問政治，更不用說入黨了；另一方面在私營企業法律上地位尚未明確之前，私營企業主客觀長期被排斥在黨組織之外。

1990 年代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在 2002 年時更逼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1993 年為 13.3%，1997 年為 18.1%，2000 年升至 19.9%，2002 年高達 30.2%。歷次全國私營經濟抽樣調查中共的黨員私營企業主比例變化如下表十一所示：

年份	1993	1997	2000	2002
黨員業主人數（人）	189	353	609	972
黨員業主比例（%）	13.3	18.1	19.9	30.2
有效樣本數（個）	1,421	1,947	3,060	3,220

資料來源：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 250。

爲什麼 2002 年的比例會高達 30% 以上呢？主持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主要負責人張厚義指出，主要原因是黨員私營企業主的來源不同。在 1980 年代的私營企業主中，人數最多的一類是農村基層幹部和社隊企業（即後來的鄉鎮企業）的廠長或採買員；其次是在農村黨員中占很高的比例有的能工巧匠、回鄉知識青年與復員榮民。但是在 1990 年代，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制變成了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多是中共黨員。2002 年的調查共有 833 家改制的企業，其中有 422 個企業負責人爲中共黨員，占其總數的 13.1%。如果減去此數，被調查者中中共黨員所占比例大致與前幾次的相差不大。<sup>30</sup>換言之，中共黨員在私營企業主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除了私營企業主開始主動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外，更大的比例是各級政府大力推動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制，使許多曾經在這些企業擔任重要角色的「幹部」有機會進入私營企業主的行列。這個情況在

<sup>30</sup>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張厚義、劉平青，「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http://www.wzdj.gov.cn/PartyBuild/fgpartyinfo.aspx?id=193>。

私營企業發展較好的省分更是明顯，根據二〇〇四江蘇省民營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江蘇省的黨員私營企業主，有高達百分之 53.79% 的比例是從公有制企業改制而產生的，在接受調查的 436 名中共黨員企業主有 234 名是通過「改制」而來的。<sup>31</sup>

從黨員企業主內部的上升比例來講，大型、特大型私營企業主的黨員比例上升更快，這也是和黨員私營企業主的來源多是「下海」的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的黨員幹部有關。原因有二，第一，黨員幹部掌握政治和社會資源，具有私人開業的先天優勢，開業後與政治菁英溝通的渠道也較通暢，所以企業規模發展較大。第二，國有企業改制的私企，相對規模本來就較大。<sup>32</sup>不同資本規模私營企業主入黨情況如下表十二所示：

企業資本規模		100 萬以下	100-1,000 萬	1,000-1 億	1 億以上	合計
已入黨企業主比例	1993	12.2	13.8	17.8	-	12.9
	1995	14.5	18.8	23	15.9	16.9
	1997	16.9	24.4	22.4	33.3	19
	2000	17.3	21.8	27.9	22.5	19.9
	2002	24.5	33.7	32.9	40.5	26.2

資料來源：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45。

江澤民 2001 年「七一講話」的發表，是進一步在共黨理論上肯定私營企業主的政治社會地位。事實上在「七一講話」發表以前，許多地方就以各種方式將私營企業主甄選為中共黨員，甚至出任基層黨政組織的重要幹部。Bruce Dickson 在江蘇所做的調查顯示，在 256 位受訪的私營企業主中有 60 位出任企業黨委書記，比例超過 10% ，他們都擁有完整的政治經濟權力。<sup>33</sup>

<sup>31</sup> 「江蘇：民營企業家中中共黨員高達四成」，2005 年 5 月 27 日，「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422072.html>

<sup>32</sup> 戴建中，「私營企業主的內部分化」，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44。

<sup>33</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對江澤民「七一講話」後，調查私營企業主申請入黨的反應有所差異。中共成都市委黨校調研組在 2001 年 7 月 17 日至 19 日，在成都市所做的問卷顯示，私營企業主爭取入黨的態度很積極，有 73% 的人表示加入共產黨的願望，82% 的人認為私企主不能入黨的規定不合理。<sup>34</sup>Bruce Dickson 調查也發現，「七一講話」後的一個星期內，有超過十萬名私營企業主申請加入共產黨。<sup>35</sup>此外，還有 25% 非黨員私營企業家亦有入黨之意願。考慮到中國只有 5% 人口的中共黨員，這種現象是讓人吃驚的。<sup>36</sup>

張厚義的調查卻呈現不同的結果。「七一講話」以後私營企業主的入黨人數只有 16 人，占黨員總數的 0.5%，比例並不是很高。深圳市自 2001 年 8 月份以來，平均每年發展新黨員 5000 多人，其中有 48 名私營企業主提出入黨申請，被接受入黨的只有 9 名。在第五次抽樣調查中，非中共黨員的私營企業主只有 11.1% 打算入黨；福建省的調查中，非中共黨員的私企主入黨意願例僅為 1.8%；廣東省對 100 位企業所有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在 69 位無黨派人士中，有一半表示不會爭取加入黨組織，四分之一的意願模糊，表示「說不清」，另有四分之一明確表示有入黨意向。<sup>37</sup>

張厚義進一步指出「七一講話」後入黨意願不高的原因，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對私營企業存在著經濟上允許、政治上疑慮的態度，造成他們中的很大一部

---

*Political Change*, pp.52-54. 此外，香港媒體披露，杭州市委和市府在 2000 年 10 月做出決定，從 10 月 23 日起，杭州私營企業主被邀列席市委和市府研究經濟工作的擴大會議。上海市清浦縣私營企業主已有 138 人入黨，52 個私營企業黨支部中有 36 個支部書記由私營企業主擔任。山東省臨邑縣也有私營企業主用鈔票買黨票的現象。雖然港媒的資料真實性仍待驗證，但可提供某種程度的參考，羅冰，「圍繞『允需資本家入黨』的鬥爭」，曉沖編，*十六大卡位戰*（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頁 108-109。

<sup>34</sup> 中共成都市委黨校調研組，「成都市私營企業主入黨意願的調查和分析」，*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8 月），頁 7。

<sup>35</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p. 104.

<sup>36</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pp.110-111.

<sup>37</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張厚義、劉平青，「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http://www.wzdj.gov.cn/PartyBuild/fgpartyinfo.aspx?id=193>

分雖然在思想上支持中共的領導，但又不願意在組織上加入黨。正如調查問卷中問及他們今後的打算時，有 80.6% 的被調查企業者回答：「在商言商，把企業辦好」。從總體上看，私營企業主期望的是在政策製訂和執行的過程中，能夠聽取他們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利益，而並非直接加入黨組織。

然而，張厚義的調查雖然顯示私營企業主的入黨意願不高，但事實上他們的參政意願還是很高的。調查表示，「如果不是黨員的話，更容易以無黨派或民主黨派人士的身分進入人大政協；如果是黨員，幾乎就喪失這種機會。」<sup>38</sup> 這個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分析，從私營企業主的角度來講，可見他們在制度當中尋求對他們最有利的參政機會。從黨的角度來講，擔憂這些參政意願很高的私營企業主，可能會逐漸不滿足於人大、政協的職務，因此必須謀思在人大、政協以外，開闢新的管道吸納這些菁英入黨來服務，以減低他們形成體制外反對力量的機率。

## 階層意識

自從 1990 年代中期私營經濟崛起以後，中國大陸學界針對「私營企業主是否形成一個階層？」的議題討論就非常熱烈，其原因是涉及到中共傳統上對「階級」劃分的政治敏感性、政治高度。從這些討論中可以看到，持正反意見的學者皆有，雖然目前爭辯尚無定論，但顯示私營企業主的發展已經是不容小覷的社會現實，同時還是獲得政界和學界重視的新興議題。本文將學者的意見分類討論如下。

首先，持私營企業主尚未形成階級意識的觀點。張厚義和劉平青認為，目前大多數私營企業主還處於圖生存、謀發展的階段，加上他們出於對自身安全與政策穩定性的憂慮，在過去的較長時間裡總是低調處理自身的政治要求，並刻意地

---

<sup>38</sup>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張厚義、劉平青，「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http://www.wzdj.gov.cn/PartyBuild/fgpartyinfo.aspx?id=193>

與政治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他們中間的多數人在政治參與上僅有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只有一部分綜合素質較高、經濟實力較強的人，開始積極地將自己普遍關心的問題提升為政治要求。因此尚未形成自覺的、統一的政治要求。<sup>39</sup>戴建中認為私營企業主之間還沒有過多的聯繫，沒有自己的組織，甚至代言人都要別的階級來充當。但是他們早晚會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一天的到來取決於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和生長速度，另外取決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sup>40</sup>

中共中央黨校青連斌認為，現階段私營企業主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更不是新生的資產階級。他認為：第一，他們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中國現階段私營經濟的發展時間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他們的經營規模又普遍較小，多數企業是建立在手工生產 或半機械化生產的基礎上的，而且很不穩定。與公有制經濟相比，從整體上講，私營企業在資金、技術、經營管理水準、產品質量等方面，還處於明顯的劣勢。第二，他們還沒有徹底割斷原有社會身分聯繫的「臍帶」。他們的前身，或者是城市普通勞動者，或者是農村普通勞動者。他們的社會身分的變換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這種變換是不徹底的，隨時都有可能變換回去，或者變換為其他的社會身分。也就是說，他們的社會身分是不太穩定的。<sup>41</sup>

其次，認為私營企業主已經形成階級意識的觀點。朱光磊認為，私營企業主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具有不同於其他階層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生活方式、意識型態和獨特的利益和要求。這一階層的根本特徵是佔有他人部分剩餘勞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而逐步提高，與

<sup>39</sup> 張厚義、劉平青，「私企參政」，經濟，2003年11月号。「中華企管網」：

<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jj/0311/0301002.htm>

<sup>40</sup> 戴建中，「中國私營企業主，開始發出聲音」，新聞週刊，2003年1月6日，頁71。

<sup>41</sup> 「中產階級在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2005年9月2日，「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546.htm](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546.htm)

社會其他階層的合作與衝突也日趨明顯。<sup>42</sup>

陸學藝和劉培峰皆認為私營企業主的階層認同意識正在形成之中。陸學藝的理由有二，第一，在歷次調查中私營企業主對自身的經濟地位、社會聲望和政治參與的認知一直在提高。第二，他們積極實際參與政治行動，而政治參與的程度是衡量一個階層是否形成階層意識的最高指標。<sup>43</sup>劉培峰則認為私營企業主存在獨立發展成一個階級的可能，但是還沒有最終形成。因為他們已經具備形成階級的第一個必要條件—佔有生產資料，但是另一個必要條件—政治組織還沒有最終形成。隨著第二代私營企業主的出現，他們內部的差異性會縮小彼此逐漸認知到共同利益的所在。<sup>44</sup>

前兩節分別從私營企業的客觀發展數據，以及私營企業主的主觀政治要求說明大陸經濟、社會的變動，下一節說明現實變化對國家所造成的壓力。

### 第三節、經濟社會變動對國家的壓力

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市場運行與社會結構的激烈變化，已經變成中共領導人高度重視的議題，中國大陸學界對這方面的討論更是方興未艾。從這些領導人的言論、調查研究小組的組成、學者間的研討會進行、以及出版品的內容與數量來看，都顯示大陸經濟社會的變動對國家形成莫大的壓力。

1995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若干重大關係》，這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改革和實踐的發展中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的指導性回答。<sup>45</sup>中共中央為了解決推進改革的理論落差，而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十二項重大矛盾提上檯面，簡稱為《十二大關係》，包括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係，都

---

<sup>42</sup> 朱光磊，*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70。

<sup>43</sup>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58-263。

<sup>44</sup> 劉培峰，*私營企業主財富積累的軌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245。

<sup>45</sup> 翁杰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年），序。

是論述的重點。<sup>46</sup>江澤民的這篇講話受到黨和學界的高度重視，中國社科院學者針對講話組織論壇，逐一討論這十二大關係，並出版**與總書記談心**一書，該書被視為是「江澤民建立治國理論的篇章」。<sup>47</sup>

在講話和書中都明白點出，這十二大關係是在改革和發展的新形勢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在深化改革以後，「還會出現新的矛盾和問題，各方面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所採取的方針和政策也都要調整」，「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幹部都要來研究者些重大問題」。其中在市場化與非有制經濟的方面，提出公有制是最有爭議的問題，**與總書記談心**中講到，「社會中所出現的懷疑社會主義論者，已經讓人難以等閒視之」。這些懷疑論者認為改革開放以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發生變化，公有制處於很不利的地位，書中寫到：

更重要的是，據統計，到目前為止，非國有制經濟已占中國國經濟成分的一半，甚至更多，而且非國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與非國有制經濟相比，從傳統意義上講最能代表公有制特徵的大型國有企業卻普遍不大景氣。<sup>48</sup>

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動還引起學界、出版界的關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自1997年開始大量出版「皮書系列」，作者是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專家，包括各部委、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對中國發展的現實提供權威性的分析。而選擇1997年開始出版的原因，則和經濟社會的變化密切相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指出：

自1997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進程已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人們對社會科學的關注程度大大的增強了，因為人們雖然在總體上對前途充滿信心，但對

<sup>46</sup> 這十二大關係包括：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係；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立更生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

<sup>47</sup> 翁杰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出版說明、編後記。

<sup>48</sup> 翁杰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131-132。

眼前的、撲朔迷離的變化卻感到缺乏把握，迫切需要專家的指引。而「皮書系列」自身所包含的內容具有權威性、實用性和普遍性等重要特點，正能滿足人們的這種需求。<sup>49</sup>

皮書系列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從 1997 至 2002 年之間，已經擴大成分析預測、發展報告與學前沿報告三大系列，共計 33 個品種。其中，又以**經濟藍皮書**和**社會藍皮書**受到的重視度最高，這兩種皮書連續多年被評為全中國優秀暢銷書。消費族群以政府決策部門、研究部門、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外企業、傳媒業為主，從 2000 年起，**經濟藍皮書**的銷售突破了 4 萬冊；**社會藍皮書**的部分內容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每年公務員考試的出題依據。<sup>50</sup>社科文獻出版社還逐漸延伸到院外，先後出版由民政部中國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編寫的**中國社會福利黃皮書**、由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編寫的**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sup>51</sup>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科學界不約而同的將關注點轉向社會變化，顯見社會階層的新變化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舉例來講，199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指示社會學研究所要進行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1999 年由陸學藝主持「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開始研究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專題。<sup>52</sup>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研究中心鄭杭生，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結構：城市社會分層研究」。<sup>53</sup>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誌，自 2000 年開始開設「中國調查報告」欄目，蒐集和發表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的調研報告。<sup>54</sup>學界也舉辦很多研討會，北京社科聯

<sup>49</sup> 慶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建社 20 週年專題報道，「從『皮書出版』到『皮書事業』」，2002 年 8 月 30 日，《新聞出版報》報導，「中國皮書網」：<http://www.ssdph.com.cn:8080/20year/mt6.htm>

<sup>50</sup> 慶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建社 20 週年專題報道，「『來自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報告之一』——四年打造一個品牌（皮書篇）」，2002 年 6 月 28 日《新聞出版報》報導，「中國皮書網」：<http://www.ssdph.com.cn:8080/20year/mt1.htm>

<sup>51</sup> 慶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建社 20 週年專題報道，「『來自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報告之一』——四年打造一個品牌（皮書篇）」：<http://www.ssdph.com.cn:8080/20year/mt1.htm>

<sup>52</sup>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 月），前言。

<sup>53</sup> 張宛麗，「中間階層的崛起和社會分層」，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51-152。

<sup>54</sup> 李惠斌主編，**中國調查報告：社會經濟關係的新變化與執政黨的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前言。

在 2001、2002 年舉辦的學術活動幾乎場場座無虛席，甚至爆滿，主要原因就是主題吸引人，兩年的主題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sup>55</sup>這些調研、學術報告和研討會，對改革經驗與前途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數據資料，許多調查研究、研討會的文章並集結成專書出版。

學者對中國社會變動的研究顯示，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形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群體」。中國社科院的「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中國都市中等收入群體」課題組研究顯示，從知識資本、職業聲望資本、工作及勞動方式、就業能力、職業權力、收入及財富水準、消費和生活方式、社會影響力七個方面綜合考量，自 1990 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類似西方的中產階層。<sup>56</sup>中國目前的中產階層不像西方社會是單純的「白領」階級，而具有新、舊之別，包含老式中產階層和新中產階層。老式中產階層如私營企業家、鄉鎮企業家和小業主等，是改革開放後市場轉型的結果。而新中產階層是一個以知識和技能謀生的階層，包括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階層等，具有現代性、知識性、專門性，可能獲得優厚待遇。<sup>57</sup>

此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 2002 年出版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引發各界廣泛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列入重大研究課題，以社會所所長陸學藝帶頭組織調研，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是首批的成果。<sup>58</sup>該報告首次闡釋中國改革開放 20 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提出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化的推進，促使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農民階級，知識份子階層）發生顯著分化。以職業為基礎的分化機制正逐漸取代過去的

<sup>55</sup> 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前言。

<sup>56</sup> 張宛麗，「中間階層的崛起和社會分層」，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50；「月入 5000 元 中產階層占就業人口近 12%」2005 年 9 月 5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9/05/content\\_3445657.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9/05/content_3445657.htm)

<sup>57</sup> 張宛麗，「中間階層的崛起和社會分層」，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頁 150-164。「中產多出自經理人員公務員及專業技術人員」，2005 年 9 月 2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484.htm](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484.htm)

<sup>58</sup> 「中產階級在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2005 年 9 月 2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546.htm](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2/content_3431546.htm)

政治身份、戶口身份，當今中國已變成爲 10 個階層，各階層之間利益差異日漸明晰。<sup>59</sup>

這些在經濟社會變動議題上的蓬勃討論，不只形成了具體的政策建言，提供黨政幹部和專業研究人員重要的參考，還得到黨和政府的正式肯定。中共領導人對經濟社會變動的問題非常重視，且鼓勵社會學者從事相關研究。從 2001 年 8 月至 2002 年 7 月，不到一年的時間中，江澤民就發表了三篇支持社會學研究的相關講話。2001 年 8 月 7 日「北戴河講話」，指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關係上的「四個同樣重要」。2002 年 4 月 28 日到中國人民大學提出「五個高度重視」，肯定哲學社會科學在治黨治國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有巨大作用。2002 年 7 月 16 日視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時提出「兩個不可替代」，代表中國共產黨正是確認了社會學的學科地位。<sup>60</sup>這些講話對曾經中斷了近 30 年，雖然恢復和重建後有所發展，但仍然相對弱小的中國社會學研究來說，獲得黨的肯定具有指標意義。

由此可見，中國學界在 1990 年代末期以後的研究，深入探討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是符合時代要求，也獲得中央肯定的。<sup>61</sup>胡錦濤上台以後依然重視社會結構問題，2003 年七一黨慶中，兩處提到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一處是「理論適應人民利益要求和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一是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緊緊把握住我國社會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胡錦濤並肯定學者的研究貢獻，指出「廣大理論工作者在理論的研究、宣傳和貫徹方面肩負重要責任。理論研究只有結合社會發展、現實生活和人民群眾，才能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sup>62</sup>

Dickson 指出，中共已經認識到，在中國經濟和社會已發生巨變的背景下私

---

<sup>59</sup> 參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sup>60</sup> 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前言。

<sup>61</sup> 鄧杭生主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前言。

<sup>62</sup> 胡錦濤，「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的重要講話」：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1946147.html>



營企業家對其形成的潛在威脅，因此製訂了兩條對策。其一，新設了一些商業性協會（business associations）以謀求在政府和私營企業家之間建立某種溝通機製。這些協會大多數由黨政官員主持。其實質是一種「團契合作主義」（corporatism），只能在政府和私營企業家之間傳達觀點和看法，而並非是西方道統意義上具有獨立利益的民間社團。其二，修改黨章，吸收私營企業家入黨，使之成爲「紅色資本家」，來減弱他們的潛在威脅。<sup>63</sup>

總結本章內容，可以得到下列結論。第一，1990年代中期市場化路線確定以後，市場透過資源配置和新興的運作邏輯，使社會經濟的結構開始產生激烈變動，特別是私營企業的擴張和發展。私營企業的發展速度很快，人數、戶數、資本額皆逐年上升，並進一步負擔國家的產值、稅收、吸納就業、帶動區域經濟等功能。在1990年代末期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後，企業公有制轉向股份制和私有制的腳步加快，使1998年以後私營經濟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政府對私營企業的發展寄予越來越大的期望。

第二，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私企主的參與政治動機提升，積極爭取成爲工商聯、政協、人大的代表，爭取階層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中共若不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則有讓他們成爲體制外反對力量的風險。第三，中共黨內還有一個既成的矛盾現象，就是國企改革後有很多黨員已經成爲私營企業主，這並不符合他們拒絕許私企主入黨的規定，因此必需尋求解決這個現存的矛盾現象。

第四，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社會巨變，引起了學界以及政府的重視。江澤民在1995年表示要推進改革深化必需處理「十二大關係」，1997、1998年後，學者展開大量關於經濟社會變動議題的調研和學術研討，這些學術成果得到領導人的肯定，江澤民在2001年至2002年之間，發表了三篇鼓勵社會學研究的講話，這在過去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由此可見，1990年代末期，特別是1998年至2002年

<sup>63</sup>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pp.159-162.

之間，中國大陸發生了激烈的經濟社會變動，引發黨、政、學的積極重視，這種經濟社會背景，醞釀了中共領導人提出「三個代表」。